

# “企业家外交”有助经济外溢性发展

■ 展艺恒

领导人出访,带什么人去,都是经过反复斟酌、深有意味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与总理随访的企业家中,马云代表着互联网和民众创业;华为任正非代表着中国优势的产业;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则对应此次金融合作的主题。近年来,总理随访企业家已经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现象,可以称为“企业家外交”现象,“企业家外交”现象隐藏着重大的经济信号。

“企业家外交”做了什么,有事实可以说明。回顾2014年总理的五次出访,从五月出访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非洲四国和非洲联盟总部,到十二月出访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泰国、老挝、柬埔寨、中国企业家们在“超级推销员”李克强总理的带领下收获颇丰。一些中国企业的老总或签单,或参加活动。

五月李克强总理访非,中土集团董事长刘志明随访。中土集团获得尼日利亚131亿美元铁路大单。同一天,李克强视察了由中铁承建的亚的斯亚贝巴轻轨工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董事长李长进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在现场详细汇报了工程建设情况。时隔一个月,农行蒋超良陪同总理访英期间,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董事长高博深签署跨境人民币合

纵观2014年随李克强总理五次出访的企业家可以看见,一方面“企业家外交”成为总理出访的“新常态”,另一方面,从随访企业家的身上也能看出国内企业发展的方向性和外溢性。

作备忘录。十月,中国北车总裁吴国华出现在出访俄罗斯的队伍中,总理向梅德韦杰夫推销中国的“高寒高铁”,而国内供应高寒高铁车辆的企业仅有中国北车一家。

纵观2014年总理的五次出访,李克强总理就为这些企业家们签下了至少1400亿美元的订单。由此可见,“企业家外交”成为总理出访的“新常态”,除了经济效益凸显之外,随访企业家所代表的行业类型,自然也就成为国内企业发展的风向标。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家外交”展示中国企业发展趋势。过去中国领导人出访,也会推销一些产业链低端的“中”字号产品,而总理近几年出访所推介的多是高铁、通信等产业链中高端的企业和产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必须把升级优化后的企业推送到国际市场,这样看来,总理随访企业家名单中的“常客”,多是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佼佼者。

创新驱动,“企业家外交”释放中国企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姿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也正处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基本推动力的中国创新型企业,便是这种力量的倡导者。马云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业态产业领域的企业家随总理出访,也正是向世界昭示着中国致力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决心,更是一个侧面展示出当代中国经济蓬勃的创业激情和创新动力。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为何也会被选入随行行列,这是因为不仅考虑到该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要看到其“成长性”。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家外交”展示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的意图。过剩的产能不代表是不好的产能。世界上很多国家由于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内在钢铁、汽车、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重工行业的产能,恰好契合

了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让国内过剩的产能释放到国外有需求的地方去,为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路径和选择。

政界领袖与商界精英的同行,给人无限遐想。

从政府而言,“企业家外交”是政府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观念的诠释。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方面需要企业自身去联系、去争取,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为企业关键时刻“推一把”。尤其是在高铁、通信等公共设施领域,国际市场的买方多为外国政府,更需要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与协调。总理在出访过程中担当中国企业的“超级推销员”,正是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主体地位的表现,也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展现新一届政府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决心。

从企业而言,“企业家外交”是企业巧用政府优势的机缘。中国的企业家跟总理走出国门,通过与外国政府的高层对接,增加了企业家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在进入国际市场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开拓了国际视野。

显然,“企业家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常态”。企业家们怎样用好这一团出访机遇,自然大有文章可以做。

(作者单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思想



## 企业家要终身学习

宋志平企业观之八

学习永无止境,我们既要善学善思,又要善谋善为。也就是说,学习、思考、实践缺一不可。企业家成长的过程应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或者说,企业家必须终身学习。

■ 宋志平

我的床头有一个塑料筐,里面放着我近一段时间内想读的二十本书。每天临睡前,我都会从里面拿一本书出来读,全部读完后我会把筐里的书放回书架,再挑一批感兴趣的书放进筐里。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好习惯如跑步、游泳等我没有,坏习惯如吸烟、喝酒等我也没有,我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这么多年来,我大量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和思考上,数十年如一日。我对自己的总结就是:平生无过人之处,只好读书。

对于我爱读书的习惯,部下都非常了解。因为我基本上是书不离手,会抓住每一点空闲时间读书。我读的书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和企业管理等多个领域。无论到哪里出差,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书店转转,能挑到一本好书对我而言是一件高兴的事。每年,我还会选几本书发给干部们阅读。

读书既是人生修行的阶梯,也是提高工作水平的捷径。多年来,勤于读书的爱好让我受益匪浅。有一次,一位记者对我说:“宋总,我感觉你是个谜一样的人。你职业经历里的几次登场都是救场,当北新集团、中国建材集团一把手时,面临的都是极端困境,但你一一闯过了难关。”我回答他:“我能做成一些事,靠的就是不断学习。”

我的职业生涯是“台阶式”的,从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厂长、厂长、总经理助理,到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几乎企业里每一个层级的岗位我都做过。每一个职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全新的,要快速适应角色并把工作做好,靠的只能是不断学习。

学习不能死读书或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也不能太过功利,只关注经营实务类的经验之谈。常听人抱怨,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观点往往好听不好用。我的感觉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许多观点不像物理、化学那么好验证,也不像数学那么好推导证明。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告诉我们经营的真正答案。我们的学习主要在于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拓展自己的思维方式,掌握必备的知识和工具,进而触类旁通,活学活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除了坚持学习以外,我还喜欢认真思考,对做完的每件事都认真进行归纳总结。有人评价我是个“师者”,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和“总结者”。其实聪明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归纳、总结、思考是一个避免犯同样错误的好办法。

读书学习是我思想的源泉,讲课与演讲也大有裨益。有的人不理解,觉得演讲之类的事凭的是嘴上功夫。事实上,演讲更多是在锻炼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系统思考能力,这对于企业家来说非常重要。

每次讲话,我都要花时间充分准备,在反复的思辨中,产生思想的火花,归纳出一些新东西。当把一件事情完整表达出来时,我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梳理。在与大家的讨论中,我会得到很多启示,原有的想法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所以,我一直把演讲当做重要的学习交流方式。

当厂长时,因北新集团的改革和发展有些突破,北京市年度工业会几乎每年都让我去介绍经验;党的十五大前后,我受邀到清华、北大等学校讲课;结合做企业的体会和人生经历,我也曾在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就读的河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做过演讲。

到中国建材集团以后,随着企业的崛起,我又被国资委和相关企业,一些省级国资委、地市政府,清华经管学院、北大光华学院等商学院邀请,介绍企业的发展思路与实践经验;我曾被中组部选聘为中央讲师团成员,也是中宣部党的十八精神宣讲团成员,还被国家行政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我的演讲之所以受大家喜爱,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内容积极正面,从不讲消极的话,也不吹嘘自己,不伤害别人,不乱议论;二是有系统的思考,能较好地结合实际;三是尽量用讲故事的方法,语言比较直白,大家容易理解。最近几年,我受邀出席过一些论坛,也接受过央视、凤凰卫视、报刊和网络媒体的采访,但我都是就自己熟悉的工作和业务领域进行讨论,本着“讲真心的话、真心地讲话”的原则,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有人担心,做两个大型企业就够忙的了,怎么还能抽出时间到处去讲课和演讲呢?会不会影响工作?实际上,抽时间和社会交流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仅可以扩大企业的影响力,也会得到难得的学习和思考的机会。也有好心人提醒我不要再去讲话,实际上,国企领导人大都不愿去公共场合讲话,怕讲错话和枪打出头鸟,但如果谁都不去讲,社会上怎能知道国企的工作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的看法是,我们有话要讲出来,我们需要和社会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这些年来,在一次次讲课和演讲的交流中,我对企业改革、战略选择、经营管理、文化建设、学习型组织、企业家精神等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升华。历任上级部门的领导都肯定了我对介绍和宣传国企发展、改革和管理经验方面所做的工作。

(下转第十五版)

态度



## 富士康误解了员工的“自愿加班”

■ 鲁扬

日前,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在全国总工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批评,富士康公司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请老总领导“走基层,看一看”。

“富士康公司的声明其实自证了该公司存在的问题。”我国劳动法律专家张喜亮研究员透过富士康公司的声明:“员工希望能够通过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分析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员工更希望在工作时间内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合理或更高的收入。铁道党校研究劳动关系专业李强老师也认为,即便是员工自愿,超时加班或加班常态化也是违法的。

让我们看看富士康公司的声明:“员工希望能够通过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企业又要确

加班不一定直接导致过劳死或自杀,但是,长期的加班之劳动强度,却可以导致员工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可以导致过劳死或自杀。在这方面,富士康的“自证清白”恰恰坐实了“祸由己出”。

保员工加班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这一直以来都是所有制造企业面临的挑战。”由此可见,富士康把员工“自愿加班”与国家法律对立起来,并且是企业“面临的挑战”,这就有理由认为,用人单位是在假借员工的“希望”,冲击法律的底线,这也反映出富士康对法律的藐视心理,富士康的态度及其用心应引起高度警惕。

在富士康的一些说法和做法中,还有公之于众的比如“富士康对员工加班问题一直都执行严格的系统管控政策。”“严格执行‘六休一’政策,给予员工充裕的休息时间”。这又不难看

出,富士康严格执行的不是劳动法律政策,而是他们自己的系统管控政策,是法律意识的淡薄。

众所周知,“六休一”并非企业工时制度的常态,按照劳动法律的规定,工时制的常态是“五休二”。富士康公然把“六休一”称之为“充裕”休息时间,简直是掩耳盗铃。

按照李强老师的解释,劳动法律政策规定,周工作40小时,月累计延长工时不得超过36小时,如果日工作8小时的话,“六休一”必定是超出了标准,即便是富士康依法支付了超时工资,如果这是他们的政策常态的话,也是严重违法行为。张喜亮也强调:超

时工作必须给予员工补休即保障员工的休息权,如果有充分理由而不能补休时,才可以加班工资补偿。这是法律原则,也是法律常识。而富士康把众所周知的过劳死和自杀案的事实,概括为“不幸事件”,足以证明其拒绝反省的心态。

加班不一定直接导致过劳死或自杀,但是,长期的加班之劳动强度,却可以导致员工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可以导致过劳死或自杀。

对于富士康所说的“我们还远没有做到完美。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也不要忽视企业的成长和进步”之词,张喜亮和李强老师都认为,努力和成长和进步都不能说明允许员工长期超时工作不是违法行为。

我们也听说富士康的老总郭台铭先生,工作起来是“蛮拼”的。郭台铭先生也希望其员工和他一样“蛮拼”,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富士康不改现行的企业管理理念,无论是在祖国大陆,还是在其他任何法治社会,“血汗工厂”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策论



## 降准发力尚需“第二点”顶上

■ 张国栋

时隔两年多之后,央行决定自2015年2月5日起再次实施全面降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同时还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措施。

央行此时降准被外界认为是“恰逢其时”。客观而言,这很有道理。包括目前物价水平较低,为降准提供了空间。国际上诸多国家都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大环境下也逼迫中国必须顺应这种潮流。此外,去年四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也显示大规模资金外流,外汇占款减少,也为降准提供了条件。降准,可以有效释放信贷资金量,使流动的资金更加充裕,同时也对引导资金成本下行发出明确信号。但是,事物都有二重性,降准自然也不是包治百病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除了必须更加关注新增信贷的效益和质量,更多地还得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的灵丹妙药,甚至是把“双刃剑”。

不可否认,数千亿可贷资金的释放将大大改善市场的心理预期,对股市、楼市、汇市都是一大利好。此次降准是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结合,既照顾总量,又突出重点,对小微企业、三农等经济薄弱领域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和倾斜。

一方面,有些利好并非真利好。比如楼市。如果引发房价大涨,显然不好。这也不是降准所要达到的目的。另

一方面,降准要起到应有的效果,应具备缺货币、货币流通顺畅、金融体系的利率传递机制良好。但反观现实,这三者似乎还不具备,起码不太完备。

目前虽无确切数字,但有观点指出,市场流动性并不缺乏,问题在于资金无法真正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如果货币总量上放水,不一定能流向急需的产业和中小企业,反而有可能再度吹大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泡沫,令产能过剩行业继续膨胀,甚至影响物

价,将前期改革的成绩被“大水”淹没,阻碍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步伐。

好在央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针对性地实施了定向降准措施。这需要各商业银行做到“对号入座”,不可随意。必须明确,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要保持促进经济增长、调结构和转方式之间的平衡,既要托住经济增长的底线,又要在底线之上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产业模式的升级换代,单靠降准是不行的。所以,在全面降准,还需要“第二点”跟上。这除了必须更加关注新增信贷的效益和质量,防止新增贷款投向产能过剩等正在调控的行业和领域,更多地还得依靠“开渠引水”式供给管理办法,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这不单是金融机构的事,需要形成共识,上下齐努力。